

罗荣渠 何兆武 刘北成 推荐 (美) R.R. 帕尔默 (R.R. Palmer) 著
(美) 乔·科尔顿 (Joel Colton) 劳埃德·克莱默 (Lloyd Kramer) 修订 董正华 陈少衡 牛可 等译



(插图第10版)

A History of the Modern World, 10e

现代世界史

——1870年起——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大学堂011

主编：李峰

副主编：张跃明 郭力 执行主编：吴兴元

A History of the Modern World, 10e (插图第10版)

现代世界史

——1870年起——

罗荣渠 何兆武 刘北成 推荐 (美) R.R. 帕尔默 (R.R.Palmer) 著

(美) 乔·科尔顿 (Joel Colton) 劳埃德·克莱默 (Lloyd Kramer) 修订 董正华 陈少衡 牛可 等译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北京·广州·上海·西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世界史(插图第10版)/(美)帕尔默等著;何兆武等译. —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2008.12

(大学堂)

书名原文: A History of the Modern World, 10e

ISBN 978-7-5062-9536-9

I. 世… II. ①帕… ②何… III. 世界史: 现代史 IV. K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79628 号

R.R.Palmer, Joel Colton, Lloyd Kramer

A History of The Modern World, tenth edition

ISBN: 0-07-325500-9

Copyright © 2007 by McGraw-Hill Companies, Inc.

Original language published by the McGraw-Hill Companie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jointly published by the McGraw-Hill Education (Asia)Co. and Beijing World Publishing Corporation.

本书中文简体字翻译版由美国麦格劳—希尔(亚洲)出版公司与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合作出版发行。此版本仅限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包括中国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及中国台湾)销售。未经出版者预先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发行本书的任何部分。

本书封面贴有 McGraw-Hill 公司防伪标签, 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08-5409

现代世界史(插图第10版)

著 者: (美)R. R. 帕尔默 乔·科尔顿 劳埃德·克莱默 译 者: 何兆武 孙福生 董正华 等

丛 书 名: 大学堂 丛书策划: 吴兴元 责任编辑: 谭钧 杨宁 助理编辑: 张炜 方理

出 版: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发 行: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北京朝内大街 137 号 邮编 100010)

销 售: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66 插页 8

字 数: 1500 千

版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教师服务: teacher@hinabook.com 139-1140-1220

读者咨询: onebook@263.net

营销咨询: 133-6657-3072 010-8161-6534

编辑咨询: 133-6631-2326

ISBN 978-7-5062-9536-9/C·41

定 价: 88.00 元

简　　目

出版前言 1	第 13 章 大民族国家在全球范围的强化, 1859—1871 年 431
序一 用“现代化”的视角解读现代世界史 罗荣渠 3	第 14 章 欧洲文明,1871—1914 年: 经济与政治 469
序二 现代世界史的标准著作 何兆武 5	第 15 章 欧洲文明,1871—1914 年: 社会与文化 503
序三 历史教科书的黄金标本 刘北成 6	第 16 章 欧洲的世界优势地位, 1871—1914 年 527
致中国读者 8	第 17 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 567
第十版序 10	第 18 章 俄国革命和苏联 605
第五版序 14	第 19 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民主政治、 反帝国主义以及经济危机 643
目 录 15	第 20 章 20 世纪 30 年代的民主与独裁 669
大事年表及地图、图表目录 25	第 21 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 695
导 论 地理与历史 001	第 22 章 冷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的重建 725
第 1 章 欧洲的兴起 009	第 23 章 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后殖民国家 765
第 2 章 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动乱, 1300—1560 年 043	第 24 章 从帝国到民族国家:“二战”后的 非洲和中东 789
第 3 章 经济重建和宗教战争, 1560—1648 年 085	第 25 章 共存、对抗和新的全球经济 829
第 4 章 西欧日益强大,1640—1715 年 123	第 26 章 对苏联式共产主义的国际反叛 857
第 5 章 东欧的变化,1648—1740 年 159	第 27 章 变动中的现代世界 883
第 6 章 科学的世界观 189	统治者和统治年代 922
第 7 章 争夺财富和争夺帝国的斗争 215	延伸阅读:建议与书目 926
第 8 章 启蒙时代 247	索　　引 995
第 9 章 法国革命 291	出版后记 我们需要一部什么样的 现代世界史 1026
第 10 章 拿破仑时代的欧洲 327	
第 11 章 工业、思想与争取改革的斗争, 1815—1848 年 359	
第 12 章 革命和秩序重建, 1848—1870 年 401	

第 15 章

欧洲文明,1871—1914 年: 社会与文化



- 74. 民主的进步:社会主义、
工会和女权运动
- 75. 科学、哲学、艺术和宗教
- 76. 古典自由主义的衰落

优势地位视作人类进步的历史性证据。

然而也还有许多欧洲人,他们认为,尚有一些人群没能享受到现代文明的好处,工人在现代财富的分配中没有获得理应获得的份额,妇女没有在现代政治生活中占有恰当的一席之地。故而,在这数十年里出现的大众新政治运动使人深信,它们是站在进步的一边的,而事实上它们也往往能够为它们所代表的集团争取到新的权利和利益。

与此同时,科学本身在对自然的理论理解方面,在改造现代社会的技术发明方面,都继续取得进展。不过也正是在这时,形形色色的思想家开始对科学知识的必然性表示怀疑,强调人类理性存在限制,由此,他们向许多支撑着大众对人类进步的信念的文化假设提出挑战。1914 年前出现在欧洲知识界的这些新动向开始侵蚀人们(至少是某些哲学家和艺术家)对人类历史进步发展的信心,并动摇了古典自由主义的乐观情绪。进步思想仍旧是所有现代文化的一大主题,但到了 20 世纪初期,进步的限制和后果也正成为历史反思、艺术表现和文化争论的对象。

74. 民主的进步:社会主义、工会和女权运动

手艺人和劳动者阶级从未用很欣赏的眼光看待资本主义或“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崛起。他们总是怀疑自由竞争、无控制的私人企业、曼彻斯特学派、自由贸易、供求法则、货物和劳务的自由市场,以及那种经济不受国家和政府支配的思想。这些都是中产阶级自由主义者的思想,而不是激进民主党人的思想。在 1793 年法国

自由主义的反对者

章头图:于 1905 年和 1916 年发表了关于相对论的科学论文后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Getty Images)

大革命中，民众领袖曾反对过它们。英国宪章派也曾直言不讳地攻击过这些在资本主义环境里存在的思想。同时，社会主义思想在欧洲大陆上四处传播，到处扩大影响。1848年，工人阶级队伍中有一个要求“社会”共和国的强大运动；尽管社会革命在当时失败了，它的威力却足以使统治阶级触目惊心，并且形成卡尔·马克思的哲学思想。随着选举权的到来，工人阶级迫切要求实现社会立法，并利用他们的政治力量去赢得更大的实现社会民主的措施。

但除此之外，在获得选举权前后，工人为了改善他们的状况，曾求助于其他方法。要反对那些控制着就业机会的资本占有者，只有两种主要的行动方式：一种是消灭资本家，另一种是与他们讨价还价。前者导致激进形式的社会主义，而后者导致工会的形成。社会主义在逻辑上意味着消灭私人雇主及诸如此类的人物，或至少瓦解资本主义大型企业。工联主义在逻辑上则意味着工人有无数理由维持他的雇主在经营上兴旺发达，以便在与他打交道时可以产生更好的经济效果。工人阶级运动就这样包含了一个从未圆满解决过的内部矛盾。

工人和知识分子

从事于工人事业的中产阶级和受过教育的人，即那种运动的“智囊们”，如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路易·勃朗、费迪南·拉萨尔和数以千计不那么出名的人，他们都更倾向于社会主义，而不是工联主义。他们把社会当作一个整体来加以考虑，把这种经济体制看成一种复杂的社会制度。他们从长远期限来思考未来，他们的时间计法慷慨地允许整个历史时代的变动。事实上那些小小年纪就参加工作的几乎未受过教育的工人们，由于他们的成年生活中除睡觉之外被消耗在某种体力劳动里，因而比较愿意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工联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上面。每个星期都比上个星期多赚一个先令，能够使在连续不断地暴露在毫无保护装置的机器面前所产生的神经紧张和肉体危机有所减轻，每天能多有15分钟吃午饭，这些比起重建社会这样一个宏伟但却遥遥无期的计划来，似乎是更加明确和重要的。工人把知识分子看作局外人，然而欢迎他们；知识分子把工人看作是目光短浅和缺乏自信力的人，但又迫切需要他们的帮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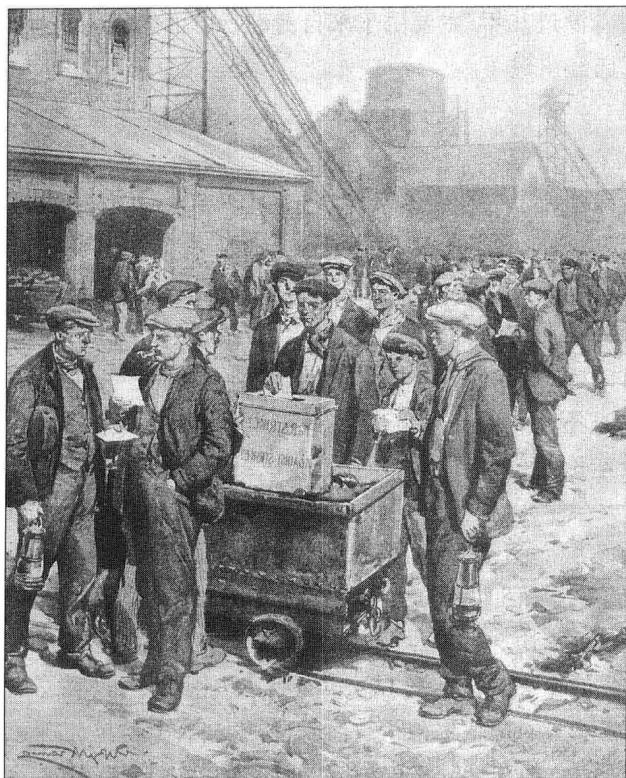
在1848年遭到失败以后，社会主义运动和工联运动的分歧持续了整整一代人的时间。19世纪的50年代与饥饿的40年代相比，是一个充分就业、工资提高和各个阶级都日趋繁荣的时代。工人着手组织工会，社会主义思想家则正在完善他们的学说。

工联运动和英国工人的崛起

603

支薪工人的组织，或者说现代意义上的工会（以别于中世纪的手工业行会），长期以来就保持着一种既模糊不清又零星分散的存在状态。但它们总是未经法律批准的，受到政府的刁难或实际上的禁止。法国革命者1791年的《列霞白利法》，英国托利党人1799年的《联合法》，都是禁止工人实行联合的货色。正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出现（在大多数情况下对工人都是非常不敏感的），才首先给予工会以合法的自由。英国工会于1825年得到自由主义托利党人默认后，直到1871年才从格拉斯通的自由党内阁那儿得到确认。法国工会被拿破仑三世承认是在1864年，后来又因“公社”起的反作用受到限制，直到1884年才最后取得完全合法的地位。在德国，俾斯麦与劳工领袖谈判，是为了从中取得支持来反对那些妨碍他行事的既得利益集团。

19世纪50年代的繁荣是有利于工会形成的，因为当雇主最需要工人的服务时，工人总是能够最容易地组织起来。同业协会亦即同行业技术工人协会，比如说木工工会，在最初时期是代表性组织。1851年，在工程师（即机械师）的联合引导下，一种“新型的”工联主义在英格兰得到



在所有工业化社会里,工会成员稳步增加,使政治生活得以改观。这幅插图描绘英国矿工就罢工事宜投票,它发表于一家意大利报纸,表现的是20世纪初在欧洲多数国家和现代世界其他地方司空见惯的那种工人行动主义。[The Art Archive / Domenica del Corriere / Dagli Orti(A)]

那些从前的技术工会会员与在他们身边工作的非技术工人联合在一起。到1900年,大不列颠大约有200万工会会员,而德国仅有85万人,法国才25万人。

大半是因为英国工人在工联主义方面取得前所未有的进展,在集体与他们的雇主谈判时相当成功地施加压力,以至于他们在形成一个工人的政党方面,比他们的大陆同行要缓慢得多。直到19世纪80年代,在公认的社会主义者已经进入法国、比利时和德国的议会以后,英国才仅有半打相应的人,即被称为“自由主义劳动者”的男性工人被列入自由党候选人的名单之中。在工联官员和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共同努力下,英国工党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得以建立起来。大陆的工会往往受社会主义政党领导,甚至由这类政党所创办。在英国,则是工会使工党产生,并随后加以领导。英国工会的影响使得工党比大陆上那些工人阶级的政党少了一些社会主义的味道。它的产生和壮大,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把工会当作业已确立并且是受人尊敬的制度来加以保护的那样一种愿望。

604 但在1901年,英国法庭的一项裁决使工会受到生死存亡的威胁,这项“塔弗维尔裁决”裁定:工会要为雇主在罢工期间所蒙受的经济损失承担金融责任。这样的话,哪怕是一次时间最短和最有秩序的罢工,都将耗尽工会的基金而毁灭工会。对“塔弗维尔裁决”的反对将工会和所有其他现存的劳工组织及社会主义组织统一了起来,并加速了现代工党的形成。在1906年的选举中,新成立的工党获得议会中29个席位,议

最充分的发展。这就是“新型的”工会官员们采取的方针:带领工会脱离政治,忘掉宪章派的半社会主义,抛弃罗伯特·欧文的全体工人都属于“一个大工会”的堂皇宏伟的设想,集中力量为各个分散行业谋求利益。这些新领导建议与雇主讲道理,避免罢工,积蓄工会基金,逐步增加他们的会员。他们在这方面做得非常成功,工会也打下了牢固的基础;这些工人阶级代言人出乎意料的温和,使英国两大政党大感放心,遂于1867年联合给予城市工人选举权。

在19世纪80年代,特别是因为导致伦敦港口自法国大革命以来第一次陷于瘫痪状态的1889年伦敦码头工人大罢工,非技术工人工会开始形成。行业的工联主义,也就是说某种行业的全体工人都参加同一工会,如煤炭业或运输业(不考虑工人个人的技术或工作),也在这时开始形成。在某些情况下,那

“新型的”工联主义

英国工党

“塔弗维尔裁决”

会因此以新立法否决了“塔弗维尔裁决”。跟着没过几年，主要由于来自劳动者方面的压力，自由党政府促使议会通过了社会法，这在上一章已经讲过了。

1850年以后的欧洲社会主义

在1848年曾经使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深感惶恐的社会主义，在19世纪50年代似乎暂且变得悄无声息了。卡尔·马克思于1848年与恩格斯共同发表了《共产党宣言》，并以一名新闻记者的身份参与指导那年在德国发生的革命之后，来到了英国这个安全的避风港。经过多年的艰苦研究，马克思于1867年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该书后面两卷在他死后方才发行。这部著作给了《共产党宣言》早先所宣布的原则以形体、内容和论据。马克思在伦敦呆了30多年，很少与当时正在建立英国工会的劳工领袖来往，简直不为英国人所知，他主要与一些政治流亡者交往，还有就是从各个国家来的临时访问者。《资本论》第一卷直到1886年才在英国出版。
605

第一国际

国际工人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864年在伦敦召开，它通常以“第一国际”知名于世。在主办大会的各种性质不同的团体里面，有英国木工工会秘书罗伯特·阿普尔加思，日渐衰老的意大利革命者马志尼，以及卡尔·马克思。由于工会官员被工会事务所吸引，协会的领导权逐渐落到马克思手中，协会遂被他当作一种工具，用来宣传他在《资本论》中所阐明的思想。随后在日内瓦、洛桑、布鲁塞尔和巴塞尔召开的那几次年会上，马克思逐步建立起他的地位。他排斥马志尼分子，指责德国的拉萨尔分子自愿与俾斯麦合作，论证与国家合作不是社会主义者的责任，而只有夺取它才是。他与俄国人巴枯宁的斗争是其中最尖锐的。鉴于自己在沙皇俄国的经历，巴枯宁将国家视为工人苦恼的根源，他因此成了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国家不但应该受到非难，而且应该取消。对马克思来说，无政府主义是令人憎恶的；正确的学说认为，国家——沙皇的或者资产阶级的——仅仅是经济状况的一种产物，是保卫财产权益的一种手段，因此，革命行动的正确目标决不是国家本身，而是资本主义经济体制。1872年，马克思从第一国际驱逐了巴枯宁。

巴黎公社

与此同时，第一国际的代表们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注视着1871年的巴黎公社，他们希望它能变成欧洲工人阶级发生巨大变化的开端。第一国际的成员渗入公社，这样两者之间发生了联系，而这，尽管有点偶然，却成了法国临时政府使用如此恐怖的手段去镇压公社的原因之一。但实际上公社扼杀了第一国际。马克思赞扬公社有如国际阶级斗争的一块里程碑。他甚至从中看到了他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迹象。这样，他吓跑了不少潜在的追随者。毫无疑问，英国的工联主义者，有理智的和稳健的人，与这种做法和这类学说是格格不入的。1872年之后，第一国际在生活中逐渐地消失了。

第二国际

但是在1875年的哥达会议上，马克思派和拉萨尔派社会主义者却尽力达成联合，以建立德国社会民主党；该党后来的成长，以及对俾斯麦扼杀它的阴谋所进行的反抗，都在前面讲过了。大约在1880年左右，社会主义政党在很多国家开始萌发。高度工业化的比利时在1879年出现一个比利时社会主义政党。在法国一些工业区，有些工人为朱尔·盖德所吸引，他是一位自修的工人，前公社社员，现在的死硬派马克思主义者，他坚持认为，靠任何类型的妥协都是不可能解放工人阶级的。另外一些追随“可能派”布罗斯博士，他认为，通过议会制度工人有可能达到社会主义。还有一些人则支持让·若雷斯，此人雄辩地把社会改革同法国的革命传统和保卫共和制度结合在一起。直到1905年，法国的社会主义团体才形成一个统

一的社会主义党。1881 年, H. M. 海因德曼按照德国模式, 沿用马克思主义的纲领, 在英国建立一个社会民主同盟, 但它从始至终只有一小批成员。1883 年, 有两名俄国流亡者, 新近改信马克思主义的普列汉诺夫和阿克雪里罗德, 在瑞士创建了俄国社会民主党; 正是从这儿最终派生出 606 下个世纪的共产主义。1889 年, 各个社会主义党聚集一起成立了一个国际联盟, 即大家知道的第二国际。尔后, 它每三年召开一次会议, 一直维持到 1914 年为止。

修正主义的社会主义与革命的社会主义, 1880—1914 年

19 世纪 80 年代新成立的社会主义政党, 全都是由马克思主义者在起鼓舞作用的。马克思死于 1883 年。马克思主义, 或者说“科学社会主义”, 凭着它在社会分析上的说服力, 和四十多年来马克思的大量著作, 以及对与之争论的社会主义学说所采取的毫不妥协的敌对态度, 成了唯一广泛流传的系统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在德国和法国影响最大, 相对地讲, 在意大利和西班牙却不大成功, 不论从哪方面讲, 那里工人阶级队伍中产业工人都较少, 文盲较多, 不能够把自己的希望寄托于选举, 并且习惯于一种加里波第式的头脑发热的造反, 这些都使得他们更加频繁地转向巴枯宁鼓吹的无政府主义。

马克思主义在英国也不完全成功。工人们站在他们的职业工会一边。中产阶级的资本主义批评家追随 1883 年成立的费边社。费边分子(名称出自古代罗马将军费比乌斯·库恩克塔特, 即所谓“拖延者”, 或运用因循渐进方法的策略家)都是些地道的英国人和不折不扣的非马克思主义者。乔治·萧伯纳、H. G. 威尔斯、西德尼·韦伯和比阿特利斯·韦伯都是该社的一些早期成员。对他们来说, 社会主义对于政治民主制度, 在社会和经济方面是相似的, 它不可避免的结果也是一样的。他们认为, 根本不需要或根本不存在阶级斗争; 逐步的、合理的与促进和解的措施, 必然会在一个适当的时间内带来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而地方政府的改善, 如自来水和电力照明这类事业归市政所有, 就是完成这个过程的步骤。费边分子和工会官员一样, 对于微不足道的眼前成就总是感到一种满足。他们与工会联合成立了工党。同时, 由于对经济现状进行耐心而又详尽的研究, 他们提供了大量有用的知识, 因而一个立法计划能够在此基础上制定出来。

英国费边社会
主义

马克思主义者, 即社会民主党在大陆上发展得十分迅速。马克思主义变成了一种不那么革命的“议会社会主义”——实际上除了俄国社会民主党以外, 因为当时俄国尚未有议会政府。社会主义政党的壮大, 意味着除知识分子外, 那些真正的工人也正在为社会主义的候选人投票, 让他们能够进入“国家议会”、“国民议会”或者冠以其他名称的议会下议院; 还意味着工会在党内的心理作用和影响越来越大。工人们, 还有他们的工会官员, 可能早已在理论上认识到, 在与资本展开的这场规模巨大的斗争中, 他们之间已经是同舟共济, 相依为命了; 而实际上, 他们的目的不过是从雇主的经营中为他们自己获取更多的好处。他们或许会相信符合工人利益的国际主义; 但事实是, 民族国家议会自始至终只会促成有利于它们本国工人的有秩序的法律——社会保险、工厂条例、最低工资或最高工时。

欧洲大陆上的
议会社会主义

不可否认的是, 到本世纪末叶, 马克思的那些预言(最初是以 19 世纪 40 年代的情况为依据的)并没有真正实现, 至少是还未实现; 资产阶级正在获得更多的财富, 可是无产阶级并未因此更穷。从 1870 年至 1900 年之间, 在工业国家里, 实际工资, 也就是说工资领取者的收入实际上可能有的购买力, 即使把由于失业造成的损失也算在内, 估计增长大约 50%。这种增长要归因

于机械化普及后劳动生产率得到了极大提高,归因于世界经济的发展、资本财富的积累、粮食和其他一些工人的生活必需品在价格上的逐渐下降。

修正主义 19世纪90年代,马克思主义开始经历一场修正主义运动,在法国领导运动的是国民议会社会主义议员领袖让·若雷斯;在德国是爱德华·伯恩斯坦,他是社会民主党国会议员,1898年曾出版《进化的社会主义》这一阐述新观点的小册子。这些修正主义者认为,阶级斗争不见得绝对不可避免,资本主义有可能被逐渐变得为工人谋利益,工人现在不仅有选举权,而且还有他们自己的政党,他们通过民主的渠道能够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需要通过革命和任何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大多数社会主义者、也就是说社会民主党人是修正主义的追随者。第二国际不得不反复地,然而却是徒劳无益地告诫它属下的社会主义政党不要与资产阶级同流合污。

工团主义 马克思主义者中间这种“机会主义”倾向,驱使真正革命的精神转入一个新方向。就这样,革命的工团主义产生了。它主要的知识分子代表是法国人乔治·索雷尔。

“工团主义”只不过是相当于“工联主义”的法语词,它设想工会自己可以变成社会的最高权威机构,它不仅要取代财产所有权和市场经济,而且要取代政府本身。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可能是一次规模巨大的总罢工,到那时,所有工厂里的每一个工人将同时一齐停止工作,以此来瘫痪社会,并迫使它接受他们的愿望。工团主义在工会最薄弱的地方取得了最大的进展,如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兰西,因为在这些地方工会并不发达,并且最需要激动人心的学说去吸引新成员。工团主义最强大的据点是1895年建立的法国劳工总同盟。

正统学说与修正主义的对抗 在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中间也有一个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复兴问题。德国的卡尔·考茨基指责修正主义者像一帮妥协分子,为了小资产阶级的目标背叛马克思主义。1904年,他和另一些要求严格遵循马克思主义的人,说服第二国际谴责法国社会主义者亚历山大·米尔朗在1899年接受法国内阁一个大臣职位这种政治越轨行为。第二国际裁决:社会主义者可以把议会当作一个讲坛,但社会主义者进入政府本身,无异于投入自己的敌人——资产阶级国家的怀抱,则是不可原谅的。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再没有一个社会主义者在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的内阁中任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修正主义问题,最初于1903年出现在伦敦——主要是因为大多数杰出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是流亡者——举行的一次党代会上。当时在列宁领导下的一个集团要求清除修正主义,列宁取得了多数,至少在当时是这样。从此以后,这些不肯妥协的马克思主义者均被称为“布尔什维克”(出自俄语“多数派”一词)。而那些自愿与资产阶级自由党人和民主党人一道工作的修正主义的或者调和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后来即以“孟什维克”或者“少数派”集团闻名于世。但是,在1903年那时,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被认为是无关紧要的。

马克思主义的转变 一般来讲,在欧洲“内部地带”,到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大多数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已不再是积极的革命者。就像革命的共和主义在法兰西第三共和国里面已经沉静下来了一样,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似乎也已经平心静气地接受了社会民主主义这种温和的学说。如果未发生1914年的战争,将会发生什么事情是不得而知的;608或许社会革命主义复兴,因为从1900年到1914年之间,不仅实际工资未普遍增长,而且,在劳工界中间,令人关注的不耐烦情绪在发展,并不时发生大罢工。但在1914年,工人阶级作为一个整体已无革命生气。工人们仍旧在寻求一个社会正义的伟大计划,可是,社会动乱是那样可怕,

对1848年那时所抱的希望已经化为泡影。这里似乎有这样三个主要原因:资本主义已尽力去提高工人的生活水平,使之高于尚存留在他们记忆中的父辈和祖辈有过的生活水平;工人有了选举权,因而感到自己在参与国家事务,能期待从新的公共政策那里获得利益,而从政府的垮台却得不到什么东西;第三,他们已经组建起自己的政党和势力日盛的工会,它们全都保护他们的利益,并帮助他们从国家收益中获得更大的份额。

女权运动,1880—1914年

当新兴的工人阶级政党在欧洲蔓延发展时,在同样的数十年里,女权运动也变得更加国际化,更有组织性。对于她们在新工业经济中完成的工作,女性获得的报酬比男性更低,在大多数地方,她们仍面临许许多多对她们的权利——拥有财产、参加政治集会、在选举中投票和进入大学——的限制。因此,女权运动继续推动自19世纪初期以来女性主义者一直倡导的改革,包括更多受教育的机会和投票权。欧洲大陆上的妇女团体倾向于强调法律改革和社会改革,而不是投票权;英国和美国的女性主义者则更加关注于争取妇女选举权的运动。但在所有的工业化社会,行动派们日渐被吸引到国家的和国际的组织当中,部分原因是这样的团体组建了有益的网络以传播消息和政治思想。美国妇女,如苏珊·安东尼和伊丽莎白·斯坦顿,与欧洲女性主义者一道在1888年组建了国际妇女理事会。对妇女权利的要求与日俱增,跨越了所有现代国家的疆界。

虽然有些女性主义者致力于让更多妇女能够节育或改善女工的状况,吸引公众最多注意力的却是对选举权的追求,在美国和英国尤是。像“全美妇女选举权协会”和英国的“妇女社会与政治联盟”这样的新组织,它们发起要求在地方选举和国家选举中获得同等投票权的请愿、群众集会和抗议等活动。在英国议会对准予妇女投票权的每一项立法建议加以拒绝——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这种官方的反对已经成了英国政治生活中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之后,英国的投票权运动变得特别富有战斗性。由于受挫于男性政治家的顽固抵制,“妇女社会与政治联盟”精力充沛的领袖——埃米林·潘克赫斯特,在1914年之前的岁月里领导投票权运动激进派从事暴力抗议运动。潘克赫斯特的支持者和同盟者扰乱议会会议、砸碎商店橱窗、捣毁邮箱并破坏政府建筑物,以此来抗议妇女被排斥在英国的选举和政治机构外。遭到逮捕后,“主张妇女参政的妇女”就进行绝食抗议,对此,警方则报之以痛苦的强制喂食。

潘克赫斯特及其他主张妇女参政的妇女遭到英国新闻界和议会广泛的讥笑,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时武力抗议被搁置)期间,她们的运动赢得了越来越多的支持,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年过30岁的英国妇女在1918年终于获得了投票权。在“一战”战后阶段的早年,妇女在德国、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也都获得了投票权。然而,争取投票权的运动只是现代女权运动的一个部分;增强妇女在经济、法律体制、家庭和教育等方面的权利的运动在整个20世纪展现出新的主题和新的政治策略。

妇女谋求投票
权

75. 科学、哲学、艺术和宗教

三个多世纪以来,对自然科学力量的相信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特点,但是以前任何时候都



英国争取妇女投票权的运动往往将妇女动员起来参与街头游行，参与公众示威，与政府官员进行交涉。在1913年的这次游行中，抗议者们跟在一个妇女的后面，她先前曾在主张妇女有权参政者的一次示威活动中被逮捕过。政府对这样的事件总是密切监视着，警察出现在现场就是明证。（Getty Images）

不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半个世纪那样。这种信念为那么多人所接受，被他们那样坚定地乐观地持有，并且抱有那样少的疑虑和保留态度。科学成了整个工业化运动的基础。科学在1870年之后已经变得绝对流行，即便对科学一无所知的人也将它视为智慧的启示，这是因为它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地显现出新的奇迹。当世界上较文明的地区刚刚领会了铁路、610轮船和电报的好处的时候，一系列的新发明问世了。在1875年之后那三十年里面，美国的专利数量增加三倍，德国增加四倍，其实，在所有的文明国家里都在成倍成倍地增加着。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就像在这个世界曾看到过的任何一次运动一样完全国际化了（尽管主要限于“内部地带”）。科学发明的突飞猛进，对于建设性的工作和人类的严重问题，起着这样根本性的作用和有所助益，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人本身的发展也产生着同样的效果。

变化中的科学观念

大约在1860年或1870年左右，基本的科学思想开始发生更加重要的变化。直到那时，一般的说法是：那些基本概念在差不多两个世纪以前已经由艾萨克·牛顿创立了。万有引力定律毫无疑问占据着统治地位，而欧几里得几何学和基础力学物理学也是不遑多让。宇宙万物的基本性质被认为是不变的、有规律的、可预告的和协调的；它也是永恒的，因此，流逝的岁月并没有带来什么变化和发展。到这个时代结束的时候，即到本章所叙述到的1914年，那些陈旧的概念已全面让位于新的概念。

进化论的影响

在对一般思想的影响中,最大的变化来自关于生物学和生命科学的新的重要论点。查尔斯·达尔文在1859年发表《物种起源》的日子,无疑具有伟大的象征意义。在达尔文之后,进化论成了热门学说。进化思想体系认为,了解任何事物的方法是去了解它的发展。而这在1859年已经不新鲜。黑格尔早已把进化论的概念采纳在形而上学里面。他,还有马克思,在他们那些有关人类社会的学说里也引用过这种思想。这种承继“启蒙时代”的进步思想,是一种进化的哲学思想;它在历史研究中的伟大活力,在浪漫色彩和民族主义的保护下,已经促使人们依据时间进程来思考人类事务。在自然世界里,1800年之后兴起的地质学为进化思想开辟了道路,生物探险家也已经在推究生命形式的进化发展了。达尔文所做的不过是给进化论盖上科学的印记,为它收集整理证据,对它是如何形成的提出解释。1871年,在他的《人的祖先》这部著作里,他对人类的产生提出了同样的假设。

查尔斯·达尔文

达尔文根据进化论指出,物种是可以改变的,没有哪一种产生之后是永远不变化的。各种各样有生命的生物体,植物和动物,形体微小的或笨大的,尚存的或绝种的,都从其他那些比它们更早的物种不断发生的细微变化中获得发展。一个重要的推论是,所有的生命都是相互关联并从属于同一自然法则的。另一个推论是,地球上千百万年来的整个生物史——达尔文时代的科学家普遍认为——是在一个无一例外的复杂进化过程中不断展露的一部统一的历史。

达尔文认为,物种的改变,并非生物体出于任何有理智和有目的的行动,而基本上是由于某种偶然性。个别生物通过遗传作用,继承了略有不同的特点,使它们在获取食物、争斗或交配中较其他个体更加有利;具备最有用的特点的生物得以保

“适者生存”

611 存,这样,它们的特点就传给了后代,直到整个种类逐渐改变为止。某些词句——它们并非全都由达尔文创造——概括了这种理论。通过“最有利的种属”的“自然选择”,一场“生存斗争”造成了“适者生存”。这里所提及的种属,并非指人类,而是就某个物种内在的素质而言。这种生存斗争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在自然界里,各个物种繁衍的个体较多,而能活完正常的一生的较少。所谓“适者”是指一个物种的那些单个的代表者,它们具有最有用的特点,如鹿的快捷或老虎的凶残;“自然”选择意味着适者的生存对于它们自己或造物主来说,都不是故意地;“有利的种属”指的是一个物种的素质具备优越的生存能力。

达尔文的思想猛然间造成一场大吵大闹。科学家争先恐后地保护他,教士则不顾一切地攻击他。生物学家T.H.赫胥黎成了达尔文的首席代言人——“达尔文的斗犬”。与他争论过的人当中就有牛津的主教。为了人从猴子演变而来的说法,达尔文遭到了极不公正的指责。这是因为有人害怕人类的尊严、道德和宗教信仰的基础会因此瓦解。在这一点上,达尔文本人一直感到自豪。他说,在文明的条件下,社会和协作的效能,是有助于生存的有用的特征,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希望那优良的习性将会得到加强,或许通过遗传固定下来”。那些冲着达尔文发出的怒气冲冲的抱怨,绝大多数可以说无甚价值或多少有点浅薄的,甚至就是那些攻击他的人,往往也不留意宗教上的见解;不过他们还没有错到一种极度危险的地步。

毫不奇怪,达尔文主义根本不提及上帝、天命或救世主;没有科学这样做过。进化论与《创世纪》第一章完全不相同,这是使人不安的,但是还不是致命的。《旧约全书》中有很多东西早已被当作某种象征来对待,至少在某些原教旨主义团体以外是

变化中的自然观

如此。认为人和动物在本质上毫无二致的思想甚至都不是灾难性的；而且，神学家对于人类天性中动物性一面一直盯着不放。但进化生物学的新颖而出乎意料的结果改变了人们对自然的观念。大自然不再是平和协调的了，它是一个争斗的场所，即“牙齿和爪子里血腥的大自然”。争斗和消灭弱者是自然现象，作为朝进化发展的手段，它们甚至是可取的。关于什么对进化发展而言是高尚的或有益的这样一些观念，向宗教有关道德和美德的传统思想发起挑战，其意义是深远的。没有固定不变的种类和完美无瑕的结构，只有无止境的改变。变化是永恒的，每样东西似乎仅仅与时间、地点和环境息息相关。没有好与坏的标准，一种优秀的生物，是一个能在其他生物不适宜生存的地方存活的生命形式，适应性的变化取代了美德。除此之外，没有什么是“正确的”。简言之，检验标准即是成功，“适者”是成功者。在这里，达尔文主义与新现实主义，即“现实政治”，和因为别的缘由在这个时候出现于欧洲的其他社会学说融合在了一起。

社会达尔文主义

这里至少包含这样的意思：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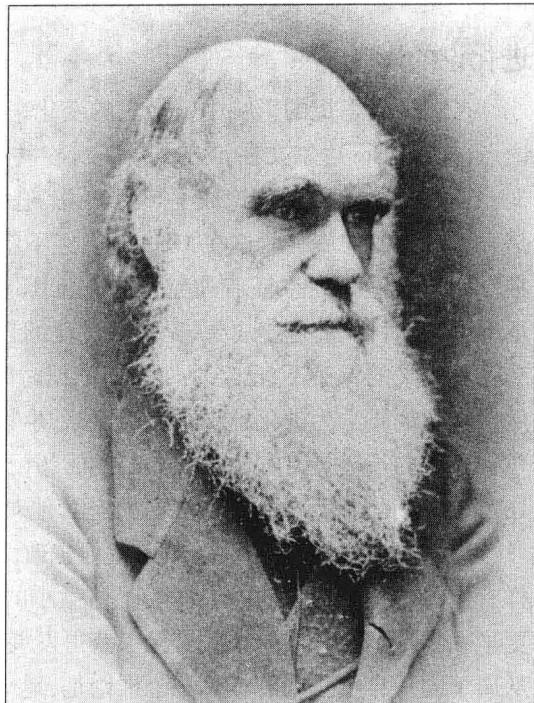
果一个人从科学得出结论，把科学的成果用之于人类，而科学的威望是如此之高，毫无疑问，这正是很多人想做的事情。随着生物进化论的推广，一个以社会达尔文主义知名的学派，把生存斗争和适者生存的思想积极地应用到人类社会来了。

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在欧洲和美国随处可见。他们的学说被派上各种用场，去证明一些人天生就优越于别的人，诸如白人对黑人，北欧人对拉丁人，德国人对斯拉夫人（或反之亦然），非犹太人对犹太人；或者那些舒适而又心满意足的上等阶级和中产阶级，他们证明自己比那些无计谋生的穷人“更适应”，因而理应享有这些福气；或者大公司不得不依照事物的自然规律吞并掉较小的企业；或者某些国家，如不列颠帝国或德意志帝国，是理应崛起的；或者就道德而言，战争是一件美好的事情，显示了那些作战者的男子气概和生存价值。

遗传学、人类学和心理学

格雷戈尔·孟德尔

与此同时，奥地利神父格雷戈尔·孟德尔，在他的奥古斯丁教派修道院里极有耐心地进行豌豆交叉授粉试验，对遗传是如何起作用的、杂交是怎样进行的，给出了一种解释。不像达尔文，孟德尔的发现发表于 1866 年，却一直为人们所忽视，直到 1900 年才被人重新发现并成为遗传学新理论的基础。孟德尔的思想预示了 20 世纪下半世纪及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在遗传科学研究和基因物质控制方面出现的令人惊异的重大



查尔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提出科学论据来说明，生命有机体存在生物进化过程，这引起了文化争议，范围远超自然科学家的学术领域。达尔文在这里被描绘成一个上了年纪、有点超然的科学专家，其祖父般的形象使人很难想到，他通过其研究和著述发起了那场知识革命。
(Library of Congress)

突破。

人类学家开始研究人类所有分支在肉体上和文化上的特征。体质人类学家对好几个人“种”感到兴味十足,他们认为,它们当中有一些从达尔文学说的观点来看,可以说是“有利的”,那就是遗传优势和较高的生存价值。这一时代的某些欧洲科学家和知识分子辩解道,白种人是最有能力的种族,他们当中又以北欧人,或者日耳曼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最优秀。公众或多或少夸张了这类观念,结果是欧洲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变得更有种族意识。在另一方面,文化人类学者以科学的无私态度,全面地研究了原始社会和复杂社会所有的风俗习惯,有时他们好像是在讲授一种比较使人泄气的学说。从科学上来讲,仿佛没有什么文化或社会比别的文化或社会“更优越”,大家都是在适应这个环境,或者只不过是一个风俗习惯问题而已。关于其他的方面,正如人们所说,微妙的差别来自“精神方面”。其结果又是一种相对论或怀疑论——一种社会准则的否定,一种信条,即认为不管对与错,都是社会习俗、心理上的条件作用、纯粹的看法或观点问题。值得强调的是,这里我们正加以说明的,并不是科学历史本身,而是科学在当时对欧洲文明的影响。
613

宗教方面也强烈地感到了人类学的冲击。詹姆斯·弗雷泽爵士在他的多卷著作《金枝》中已然论证,基督教一些最神圣的惯例、仪式和思想并不是独一无二的,而是可以在大量前现代社会中找到的。此外,在巫术和宗教之间只有一条最模糊不清的界线。人类学,一如达尔文进化论,大大扰乱了传统的宗教信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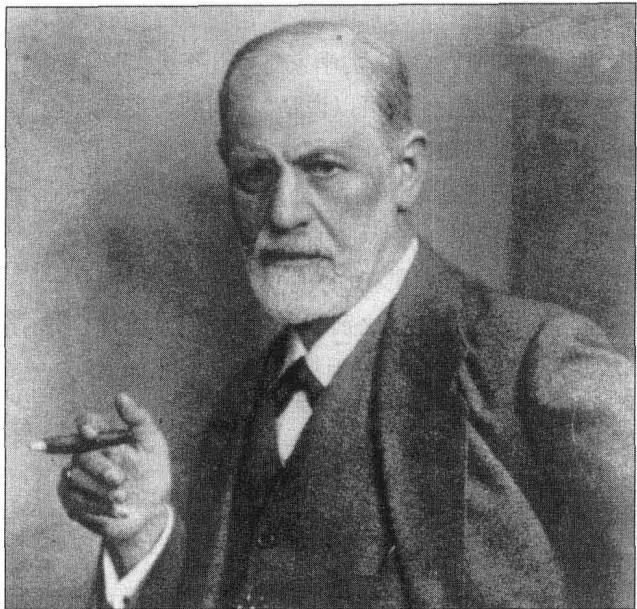
人类学与宗教

心理学作为人类行为的一门科学,彻底推翻了有关人类自由和理性本性的含义。它作为一门自然科学,由发展了各种新实验技术的德国心理学家威尔海姆·冯特在19世纪70年代开创。俄国人伊凡·巴甫洛夫进行了一系列有名的实验。他在实验中让一些狗在一个时期内养成把喂给它们的食物与铃声联系起来的习惯,从而造成狗在铃响时无意识地过量分泌唾液这样一种“条件反射”。巴甫洛夫的观察结果是重要的,它启示了动物——以及人——的大部分行为,能够在条件反射的基础上加以解释。就人来说,这些应该是条件反射:人由于环境和早年教育的缘故,已经养成自动作出某些反应的习惯,而他们作出这些反应并不是通过选择或是进行自觉的推理的。

在对人类行为的研究中,所有进展里面最有意义的要数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和受其影响的那些人的工作。弗洛伊德是维也纳的一位内科医生,他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创立了“精神分析”学说。他相信,精神紊乱的某些形式,如歇斯底里,是可以追溯到病人一生中那些已经被遗忘的早期轶事的。在最初试用过各种技术以后(比如他很快就放弃了催眠术),他应用了自由联想,即自由回忆。倘若病人能在指导下把这些被压抑的经历带进自觉的回忆里,病症往往就会消失。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和他的追随者就从这儿开始探索无意识在人类整个行为里所起的作用,他本人则强调性的驱策力。在他最著名的著作之一《梦的解析》(1900年)里,他强调要把梦当作了解无意识行为的钥匙。另外,他还把他的发现与宗教、战争、教育、艺术及文学联系在一起。弗洛伊德和弗洛伊德思想对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大量弗洛伊德学说的词汇后来被吸收进日常用语和大众文化中去。由于揭示了人类行为中非自觉控制的广阔领域,心理分析最深刻的意义在于提醒人们:人类在本质上并不是完全有理性的生物。尽管弗洛伊德认同启蒙运动的科学传统,对于古典自由主义和启蒙运动关于明智的、自由的人是如何展现、如何解释他们的个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对无意识的刻划重塑了人类心理学的现代观念,不仅对心理疾病的医治,而且对艺术、文学和社会理论造成深刻的影响。然而,正如这张照片所展示的,“革命的”弗洛伊德博士也是有着自己的文化背景——20世纪初维也纳职业阶层——的典型成员。(Culver Pictures, Inc.)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为原子是一切物质的基本单位,希腊人在古时候曾把它想象成一个固体的弹子球,坚硬但无结构,是永恒的和不变的。而且,物质和能是互不相干和性质截然不同的。

但从1896年起,一连串新发现意义深远地改变了这种观点。1896年,法国科学家安托万·亨利·贝克雷尔发现了放射现象,观察到铀放射的微粒,即能的辐射线。在紧接着的那些年份里,从法国科学家皮埃尔·居里和玛丽·居里、英国科学家J. J. 汤姆生和卢瑟福勋爵的观察和发现看来,原子非但不简单,而且相当复杂。此外,各种放射性原子由于本性不稳定,因而在其衰变过程中释放出能量。德国物理学家马克斯·普朗克在1900年说明,能的释放和被吸收,是以其特定的和不连续的单位或者称作束的形式进行的,每一分立的单位叫一个量子;而且,能并非像先前所想象的那样是在平衡而连续不断地释放的,也不像过去曾推测的那样是以物质来加以区别的。1913年,丹麦物理学家尼尔斯·玻尔假设了一个原子的构成:含有一个原子核,被一些带电的单位所围绕,这些单位俗称电子,每个电子都沿自己的轨道绕着原子核旋转,就像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太阳系。

$$e=mc^2$$

认为物质可以改变其性质这样一个备受炼金术士偏爱的观念,长期以来都被科学家置之不理,时至今日,由于放射性科学家的工作,人们才重新认清它的意义。用一种炼金术士连做梦也想不到的方法,物质就可以变成能。对此,德国出生的犹太科学天才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用了一个有名的公式($e=mc^2$)来表示。他的相对论还形成了影响深远的革命性概念:时间、空间和运动不是绝对的,而是与观察者和观察者本身在空间的运动密切相 615 关。后来在1929年和1954年,爱因斯坦像牛顿先前所做过的那样总结出一个普遍适用的定律:

人利益和信仰并如何依之行动所作的假设,他的无意识理论还是表示了怀疑。

新物理学

19世纪生物学的革命,与心理学和人类学的发展一起,很快就被物理学所发生的革命赶上和超过了。19世纪90年代后期,物理学正处于一个革命性变革的开端。像17世纪的牛顿力学和19世纪的达尔文进化论一样,614 新物理学代表了历史上伟大的科学革命之一。没有任何单独的工作能够与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相比拟,除非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由爱因斯坦发表于1905年和1916年的一系列科学论文所提出的相对论,可以被认为与它们同样伟大。部分是从数学上得出的、然后是根据日渐丰富的经验得出的一系列发现和研究成果,取代了旧有观念,使人们对物质和能的性质有了新的了解。牛顿物理学认

统一场论,一个对万有引力、电磁和亚原子态的解释。虽然它令人费解,而且至今还是无数科学争论的主题,它却大大地修改了自从牛顿以来早已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观念。牛顿世界正在被一个四维世界、一种时空连续统一体所取代。在数学领域里,非欧几里得几何学发展起来了。

还有,当物体以光速运动时,因果、时空和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在亚原子世界里统统都没有多大意义,实际上在宇宙中也是这样。德国科学家沃纳·海森贝格在不久后的1927年,用他那测不准或不确定原理证实,要同时确定单个电子的位置和速度是不可能的。正是在这些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建立的科学基础上,人们发展了新的学科——核物理学,并逐渐对原子能加以开发利用。人们发现,原子及其亚原子微粒的世界甚至比1914年以前所设想的还要复杂得多。

哲学和艺术的倾向

虽然有些作家和艺术家如同早期浪漫主义思想家一样,抨击启蒙思想和现代科学,但这一时期欧洲的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将科学视作所有知识的典范。他们陶醉于实证主义,相信科学方法给世界提供唯一“确实的”知识。因此,科学不可能知道的任何事物肯定是永远不可能被知道的——这种学说被称为“不可知论”,或者叫做对无知的承认。赫伯特·斯宾塞在英国,厄恩斯特·海克尔在德国,都是得到广泛响应的不可知论的鼓吹者,两人都描绘了一幅由达尔文进化论统治的天下万物的景象。斯宾塞特别指出,通过进化学说,能够把各派哲学统一、组合和协调起来;他不但把这个学说用于所有有生命的东西,还用于社会学、政府和经济。他觉得社会的进化在朝着日益增加个人自由这个方向发展,政府的责任不过是维护自由和公正罢了;它们不应该妨碍社会和经济的自然进程,也不应溺爱弱者和不适宜者。然而,像达尔文本人一样,斯宾塞也相信,利他主义、博爱以及良好的意愿,作为个人道德上的优点来讲,本身是有用的,而且是进化发展的产物,因此是值得赞美的。
616

后面这些观点并未被当时另一位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所接受。这位立论严肃的著作家也同样受到进化论极大的影响。但他与其说是一位科学的哲学家,倒不如说是一位艺术的哲学家。他博采广纳本世纪为数众多的知识流派,是一位既不系统又令人费解的思想家。关于他,要给以公道的评价实属不易。然而有一点显而易见,他是瞧不起现代民主社会的。他以进化思想为幕障发展了某种“超人”思想:“超人”是一个新型的伟人,他创造新的伦理价值和哲学真理,使他能够支配和迷惑群众。谦卑的品质、容忍



1900年后物理学的新理论改变着早先的牛顿科学,使年轻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赢得国际声誉。此图显示20世纪20年代爱因斯坦站在放着书籍和论文的书架旁,数年后为躲避纳粹德国的压制和迫害,他迁居到了美国。(Getty Images)

不可知论

弗里德里希·尼采
